

北京，你不再繁华得六亲不认，不再古老得千秋万岁……  
你是我沧桑的不老的情人。



石一枫 著

# 恋恋北京

北京，你让我们爱也让我们恨，  
你让我们眷恋也让我们恐惧，  
你让我们一往情深也让我们愁肠百结。

北京，你不再繁华得六亲不认，不再古老得千秋万岁……  
你是我沧桑的不老的情人。

# 恋恋北京

石一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恋恋北京 / 石一枫著.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04-2070-2

I. ①恋…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1 ) 第165104号

恋恋北京

---

策 划：青豆书坊

作 者：石一枫

责任编辑：余守斌 熊文霞

文字编辑：信宁宁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 100037 )

发 行 部：( 010 ) 6899 5968 ( 010 ) 6899 8733 ( 传真 )

总 编 室：( 010 ) 6899 5424 ( 010 ) 6832 6679 ( 传真 )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话：+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40mm × 940mm 1/16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7.75

版 次：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2070-2

定 价：27.5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 6899 8638

# 目录



1 中关村	1
2 圆明园	12
3 哈尔滨	26
4 四合院	37
5 凤凰岭	53
6 后海	63
7 拘留所	78
8 前八家	94
9 拆迁工地	107
10 东四五条	119
11 美国	135
12 天安门	165
13 北太平庄	182
14 又一个拆迁工地	193
15 新疆	211
16 望京	219
17 她的北京	233
18 我的国道	261
尾声	275

## 1 中关村

我和姚睫认识，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假期刚刚结束的时候。

那个年我是一个人过的，但却感觉非常疲惫。我父母在海南买了一套酒店式公寓，为了不浪费那套房子，最近几年都是在那边过的。据说这种“候鸟”的状态，在退休老干部里是非常时髦的。海南的房价涨起来之后，更有不少人很是羡慕他们，说他们“想得开”，有先见之明。但在我看来，父母几乎是被我气到天涯海角去的。对于我这个逆子，他们正在学着抱以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不知道这样的家庭关系，在退休老干部里是不是也很时髦。

春节晚会进入高潮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内疚起来，便在沙发上靠着，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视上，几个东北小品演员正在向全国人民拜年。大哥，缘分呐；大兄弟，缘分呐；海上生明月，天涯赵本山，缘分呐。眼下这个时刻所说的任何废话都是真理，而且是全体中国人必须遵从的真理。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后，几乎想说：“你们把我生出来，也是缘分呐。”

而我母亲则公事公办地问我：“晚上和谁吃的饭？吃的什么？有没有吃饺子？”

我说：“吃饺子了，三鲜馅儿的。”

她陈述：“我们也吃了，是鲜虾馅儿的。我还给你爸爸买了一顶巴拿马草帽，这样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就不会把脸晒成蒸螃蟹了。”

我仿佛闻到了海洋的腥味儿。而更让我凄凉的是，我父亲仍然拒绝和我说话。他通过母亲指示我：“不要喝太多酒，不要吃过于油腻的食品；到了你这个年纪，即使开车出门，也必须要穿秋裤了；老寒腿是很可怕的，一旦得上，你的后半辈子就只能在海南度过啦。”我一一遵旨，谢阿玛挂心。

对于父母如此强烈的养生意识，我也表示欣慰。再说了点儿别的套话，母亲又告诉我：“前两天在清水湾看了一套更大的海景房，特别适合养老。我们就琢磨，索性把小的这套卖了，再添点儿钱……”正说着，窗外的鞭炮声便大作起来。快要12点了，新的农历年就要来临了。我打断母亲：“您听听，解放军马上就要攻上来了。”母亲像叮嘱孩子一样说：“你要是放炮，可留神别崩了手，点不响的炮就让它搁着，千万不要过去看……”

我鼻子一酸，挂了电话，用手指捏了两个速冻饺子，嚼得满眼是泪。发了几分钟的愣，我穿上呢子外套出门，仰头看着一个个奋力向上腾跃的火球。每个火球都如约炸响，在夜空里开出一朵花。和平日相比，北京已经接近于一座空城，现在只好由火焰来填满它。我在大街上遛了好久，只看到几个窜来窜去放炮的孩子，益发感到自己身处于无比宏大、空洞的世界里，而且还这么冷。

回到家里，我看到手机躺在桌上，亡命挣扎一般亮着。收信箱里装满了例行公事的拜年短信，一律是鸡年咏鸡、狗年咏狗的行文风格，和晚会相声一个思路——今年歌颂到“猪”这种动物了。除了短信，还有一个不知是谁打来的电话，号码是一长串的“2”。显示出这样的数字，可以判断它是从国外用IP卡打过来的；看着它，我想到了旅居海外的几个朋友，也想到了自己的前老婆。最后，我开了一瓶人家送的“强尼走路”威士忌，在虚空中和那号码的主人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一个与我隔了一昼夜的时差、不知是谁的“故人”，陪我度过了新年。



此后的几天，家在北京的朋友纷纷从浩大的走亲戚运动中脱身，开始聚众酗酒、打牌，席间还总会冒出许多“同学的妹妹”或“妹妹的同学”。我可算有了事干，频繁赴局，常常开着车过去与人痛饮，喝高了就把车留在饭馆或谁家附近，自己打车回家，次日再打车过去，开上那辆四门乱响的“雪佛兰”奔赴下一个聚会。一定要开车，是为了找个不喝酒的借口，但这也给朋友们留下了笑柄：“装什么逼呀，每次都是你自己灌自己。”

如此几天之后，我终于忘了车究竟被扔在哪儿了，只记得自己在丢车那天的聚会上，曾经抱着一个人哇哇大吐，被人强行送回家时，犹在慷慨激昂地抒情：“让列宁同志先走！”

我只好给常聚的几个人一一打电话：“鄙人粪口喷人那天，具体地址是在哪儿啊？”一个在报社当记者的发小坏笑着说：“你是不是连喷了谁都忘了？”“肯定挑了个尖果儿吧？”那人往下流的方向引申：“那肯定，这是你的本能——过去就特喜欢在高峰期坐公共汽车，伺机往年轻女性身上刷糨糊。”“别拿你们报纸法制版上的案例往我身上套。”我笑骂，“当年在澡堂子里，一泡尿扫射了一排小姑娘的人不是你么？幼儿园阿姨都管你叫流氓犯。要不是年龄不够，严打运动中第一拨发配新疆的就有你。”

按照记者“马流氓”的指引，我赶到中关村的“俏江南”餐厅附近，在立交桥底下的停车场找到了车。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大部分还没有回京，也没人管我收停车费。看看蓝色铁牌上的收费标准，我在心里做了个乘法，然后窃喜着到单位点卯。

我混饭吃的那家“文化、传媒、时事网站”，其背景就像它的定位一样含混不清——本是一家以代售话剧票为盈利模式的网站，创始人是我上大学时的河南同学B哥，后来被某国有报业集团裹挟着一笔莫名其妙的境外游资收购了。B哥也有幸成为互联网烧钱运动所造就的第一拨富人，在东四五条买了一个四合院，门口煞有介事地立了俩石狮子。那个时候，我正失业在家，亏得B哥仁义，声称我是创业时期的“元老”，收购条件之一就是给我保留一个职位。我到

这儿“上班”之后，才发现话剧票务并不像B哥所吹嘘的那样赚钱，只好急吼吼地转型，想干赚钱的领域；但几个出资方一家一个主意，调和到后来，就成了眼下这种什么都干、却又等于什么都没干的局面——广告倒是没少打，只是回报甚微。而我干了一段时间，互联网行业的钱也烧得差不多了，员工中的志向远大者纷纷跳槽去搞物流、搞房地产，我这个“拖油瓶”反倒成了最有操守的人。除了“迟到早退和即兴旷工的权利”以外，我没向单位提出过任何非分要求。

因为很久没这么早在办公室露过面，我进门之后倒把管事务的大姐吓了一跳。她问我：“刚过完年，抽什么风啊你？”“过年实在太无聊了，我现在特别想工作。”我坐到“卡座”上打开电脑，开始浏览“当日趣闻”。大姐慈祥地瞄了我两眼，然后通知我两件事：第一，中午到大堂去领正月十五的元宵；第二，单位正在招聘，她决定让我作为“主管业务的部门领导”去参与一下。元宵节发元宵，很好理解，这是国企的好传统。但让我去参加招新，就有点蹊跷了。这可能说明的问题有：一、单位从什么地方骗着钱了，要启动什么骗人的新项目；二、单位开始把我当个人物看了。后一条比前一条更加难以理解。

当我像一个真正的“媒体从业人员”一样端着咖啡杯、哈欠连天地走进小会议室的时候，长条桌子的另一侧已经端坐了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男两女，两个漂亮一个丑。很幸运，漂亮的两个都是女的，其中一个乍看上去很像一个桃儿。我点了个头坐下，一声不吭地听着“人力资源部”的同事问东问西。他们问了应聘者几个浮皮潦草的问题：你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的是什么专业？当没当过学生干部？然后又让每个人进行了一小段英语会话。走完这些过场之后，人力资源部的人很没兴致地互看了一眼，然后合起文件夹准备离开。

“这就完了？”我咽下一口咖啡问他们。一个家伙若有省悟地哈哈一笑，宣布：“下面是业务方面的面试，由评论部的赵小提





负责。赵小提先生是知名的媒体人，我们网站每周都有他的时事评论……”

我作惭愧状，看着他们离开后，扭过头来兴致勃勃地和应聘者闲扯。那个男生极力强调自己当过学生会副主席，还是团委副书记，“参与筹备过很多重大活动”，其中居然包括举世瞩目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幕式”。他一定亲手派发过很多盒饭，并和100多个大腕儿合过影。

“那您来我们这儿真是屈才了。”我把他晾在一边，去看那两个姑娘，“你们呢，都有什么特长？”

“我会跳弗拉明戈，国家舞蹈协会认定的三级。”一个尖下巴姑娘大言不惭地说，“并且我也是学生会的，当过文艺部长……”

“你说的弗拉明戈，是那种会把人的屁股变得很大的舞蹈吧？”

“并没有……”

“我的意思是，屁股大对当一个网站编辑或许是有好处的——我们需要长期保持坐姿。”

看出我的揶揄之意，那对男女都仇恨地看着我，但脸上仍然笑着。我沉默片刻，他们便讪讪地告辞离开，只剩下长得很像桃儿的那个女孩，孤零零地坐在我的对面。

“您好像对当过学生干部的人有成见。”看到我不说话，她轻轻说。

“那怎么会，都是栋梁之材。”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都是……比较有心机的那种人？”

“绝没有。我也是钻营之徒，我还托关系买过公家用剩下的便宜车呢。”

“那就行，谁也别看不起谁。”桃儿姑娘笑了笑说，“我也放心了，我也当过学生干部。”

“不奇怪，咱们这个国家干部是有点过剩——甭谈这个话题了。”我百无聊赖地摆摆手，“说点儿有用的，今儿有一韩国演员自杀了，就这个事儿，你发表发表评论吧。看你适不适合干新闻这

口儿——南方报业也有类似的考题。”

“是崔英爱吗？”

“名儿我忘了，好像演过李承皖部队的女军医。”

桃儿姑娘看着我眨了眨眼，我也同样对她眨了眨眼，等她说话。但过了几秒钟，她说：“我能用笔写么？”

“你太过认真了……”

“我有个障碍，想集中力气说出一个意思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

“那你写吧，”我感到很滑稽，“反正我们招的也不是新闻发言人。”

征得同意后，我点上一颗烟，看着桃儿姑娘从米老鼠书包里掏出牛皮本奋笔疾书。她的握笔方式很正确，字一定写得又快又秀气，写着写着，脸旁的一缕短发就耷拉下来遮住了眼睛。她一面继续写，一面把那缕头发撩上去，固定在耳朵后面，如此两次三番。

过了十来分钟，我正看着写字楼窗外的烟囱出神，她用笔敲敲桌子：“好了。”

“那收卷了。”我忍着笑走过去，拿起她的本子看。很有意思，她一口咬定崔英爱是因为做了过多的整容手术、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才自杀的。按照她的理论，硅胶埋在人的身体里，就像癌细胞一样令人疼痛难忍；而疼得不想活了的例子在古代也不是没有，初唐大诗人卢照邻就是因为不堪忍受风湿性关节炎，索性跳河了。我摸摸腿，庆幸自己听了父母的劝，今天穿上了秋裤。

“怎么样？”她问我。

“卢照邻那个事儿确凿么？”

“我选过中文系的课。”

“你本来是什么系的？”

“城市环境系。”

“现在还有这么个系……”我想了想自己的权限，然后告诉她：“你可以参加复试——假如有复试的话。”



两天后，我又在单位亲切会见了桃儿姑娘。这时我才知道她是我的母校毕业的，本来打算到南方找工作，但是临了又变了卦，于是错过了去年夏天的就业行情，只能等着我们这种半死不活的单位来“捡漏儿”。她也向我抱怨，北京的物价太高了，如果再找不着工作，就只能顿顿吃方便面了，因为她不好意思再管家里要钱了。总的来说，这次会谈的气氛可谓相洽甚欢，我讲了好几个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老师的笑话；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还对我说“师兄再见”。但是她后来又去了一趟人力资源部，打听究竟要不要她，出来时脸色就是煞白的了。我向她点头，她也没理我，满脸稚气的倔强，噤噤地朝电梯走过去。

我愣了会儿，拐进人力部门，问他们招聘的事定了没有。

“你还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个主管诧异地看着我。

“怎么回事？”

“已经被咱们的国企股东内定了，是他们一个负责人的什么亲戚。”

“可我已经让人家复试了……”

“谁让你跟人家充大个儿的。”那厮鄙夷地笑道。

自然而然，我有了一种让人当蠢货玩儿了的感觉。再想想桃儿姑娘，她的这种感觉一定更加强烈。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自己十分愧对于她。按说这些年，信口开河的事儿我也没少干，空手套白狼的歹心更是起过不止一次，在不同嘴脸的人面前捶胸顿足、指天发誓之际，我从来没有感到对不起他们；而这一次，却让我有了无地自容之感。这不失为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也许是面对那位桃儿姑娘的时候，我有了这样一种幻觉：自己并非一个30多岁的“老泡儿”，而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愣头青。

我端着咖啡杯，在座位上响亮地咂巴了几声，感到自己无法在这儿坐下去了，便拎上包摔门而出。中关村大街上阳光灿烂，“第三极”大厦的玻璃外墙更是将阳光整齐地切割成片，以标准化的形

态投射到人们头顶，照得人眼晕。春天的确快要来了，路上的风也并不凛冽，敞开衣服快步行走时还很舒畅。整条街的人看起来都心情不错，除了一个人。

我拐了个弯，朝着母校所在的方向前进，果不其然，没一会儿就看见了桃儿姑娘。她正在一个报亭前驻足，翻看着一本《书城》杂志。我插着兜，在她斜后方站了几秒钟，而后还是决定躲到公共汽车站的广告牌后面。这时，摊主大声问她买不买杂志，她说这期不是她想找的，上个月的还有没有？摊主弯腰，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本，“啪啪”拍打着尘土，大度地说：“两块钱给你了。”

她把杂志揣到米老鼠书包里，扭身继续走向学校的方向。有一些这个年岁的姑娘，走路时脚步总是故意拖沓，运动鞋的鞋跟仿佛都不怎么离地，这么走道不免很费鞋；但因为她们有着年轻的脚踝、膝盖和腰肢，整个姿态仍然显得很轻盈。桃儿姑娘走路的样子，就属于这种既懒惰、又轻巧的类型，让人想起一颠一颠的小鸟。她还有一双格外大、格外厚的毛线手套，图案是黑白相间的斑马条，由一根绳子相连挂在脖子上。因为手没揣进去，这两只手套就在她的胯部两侧跳起舞来，好像无所事事地对路上的自行车招手。她那件亮黄羽绒外套明显大了一号，像个厚壳子把人罩在里面。一定要穿大一号的衣服，也是如今很多年轻女孩的审美趣味。而从这个背影看上去，她并没有显现出难过的迹象。也许她是个没心没肺的人。

我刚刚有点欣慰，随后就意识到自己猜错了。走到“中关村图书大厦”对面的那个麦当劳门口，她拐了进去，到柜台上买了一只巨无霸汉堡和一杯热饮，然后坐到靠窗的位子上吃起来。她的每一口都咬得很大，执意要把嘴巴全塞满，脸鼓起来的形态就更像一只桃儿了，而且还是一只水果摊上无人问津的桃儿——两眼木木地看着窗外。吃着吃着，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动作既短促、又用力。然后再吃，然后再抹眼睛。她是不是哭了呢？我站在麦当劳门口，无法从侧面透过玻璃看得太仔细。但是她那奋力大嚼汉堡的样



子让人心疼。

当她把包装纸揉成一团、站起身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点下作：简直是一个尾随少女的无聊老男人。这个念头让我哑然失笑，慌不迭地转身走开。走到“海淀图书城”的入口处，我回头望了一眼，看见桃儿姑娘的背影消失在大拨儿轰过马路的人流中，如同一只梅花鹿藏身在骆驼群里。

此后的几天，我再没心情上班，一直窝在家里看电影，顺便给马流氓的报纸写了几篇口水文章，他们让骂谁我就骂谁、让捧谁我就捧谁，连“张艺谋翻开了人类视觉艺术的新篇章”这种话都说出来了。闲在家里做寓公的B哥跟他的第三任“蜜”闹起了矛盾，大半夜的跑过来滋扰我，我们便挨个儿给人打电话，召集人打牌。被有家有业的朋友们臭骂一轮之后，B哥笑咪咪地往桌上铺麻将布：“玩儿四川麻将好了，两个人也可以打。”

他又问我：“按电子游戏的规矩来吗？谁输了谁脱衣服？”

我说：“玩儿肉体太刺激，我受不了，还是玩儿钱吧。”

我们面对面地打了17个小时，脸都打肿了，结果被这个资本家剥削了1000多块。我掏钱的时候，他执意不收，我差点急了：

“福贵少爷他爸是怎么教育儿子的？赌债也是债。”

然后我们占据了沙发的一头一尾，四仰八叉地睡了20个钟头。十多年前，我和B哥在北大南门的小饭馆里酗了20瓶啤酒之后，也是这么一个睡觉的格局。当时我的前老婆正在和我闹别扭，他则被一个校女子篮球队的得分后卫粗暴地夺走了初夜，大家心情都很沮丧。饭馆老板也不敢叫醒我们，来来往往的顾客只好一边吃着肉丝肉片，一边听我们俩在梦里骂街。

而如今，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B哥的心态就没有那么穷凶极恶了。他霸占了我的卫生间，仔细地刷牙洗脸，往背头上抹了半瓶摩丝，然后坐在马桶上耐心地打起电话来。拎着裤子出来时，他向我宣布：第一，他刚刚收到一条“内线”，在股市里斩获了

100多万；第二，他决定拿出一部分利润，开办毕业十几年后最盛大的一次同学聚会。“同学见同学，就是搞破鞋。”我打起精神来附和他。

因为时间定在周末，地址又是城北一家以奢侈著称的度假村，在北京的大部分同学欣然前往，就连过去跟B哥有仇的几个人都来了。“狠狠地吃丫的、喝丫的、叫小姐日丫的”，我这么劝那些家伙。应该说，那次聚会的一切环节都很完美，鲍鱼烧烤吃得我鼻血都快流出来了，不完美的反而是我们这些同学。让人诧异的是，原来很有意思的一帮混蛋，现在怎么变得这样面目可憎、索然无味——不光是别人，就连我也如此，常常干坐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好举杯：“都在酒里。”而我分明看到，酒里融化着这些词语：无聊、衰老、认命。这就是生活酿给我们的毒酒，而我们必须一饮而尽——或者说同归于尽。

更让人失望的，莫过于出席的女宾。有人说女同学是世界上老得最快的人，这的确是真理。就连过去几个全校著名的“破鞋”，如今也无可避免地凋零了。破鞋旧到一定地步，反倒生出了古董般的傲慢，她们自己凑成了小圈子，喋喋不休地聊老公、聊孩子，和男同学的交往仅限于与一个重点小学的“校长助理”讨论择校费打折的问题。

到了集体泡温泉的时候，又变成我和B哥这对难兄难弟缩在小池子里躲开众人。“我是不忍心看她们，都能想象出耷拉成什么样儿了。”B哥恶毒地骂着曾经觊觎过的几个女生。

“我们都得承认自然规律。我怀疑，牛顿发现地心引力并不是因为苹果树，而是见了一个分别多年的老相好。”

“老了，都老了。”B哥居然露出了老年痴呆的神态，连嘴都歪了。

“我不同情你，我还没老。”我突然于心不甘，披上衣服从他身边蹦出去，脚一滑，差点摔到地上。

经过仍在扎堆聊天的女同学时，我听到她们正在说我前老婆的



事儿。一个娘们儿信誓旦旦地说她“现在保养得特别好，还那么瘦”，而且“快和一个德国裔美国籍的投资公司副总裁结婚了——是个老头儿”。据说我前老婆又换了一个法文名字，叫“索菲”。看到我走过来，她们也没停嘴。我怀疑她们简直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当天晚上，我没和別人打招呼，就独自开车回了市区。驶过四环路旁边的一家商场时，看见几百个青年男女正排着大队，等着兑换网上买的便宜电影票，许多男孩把女朋友裹在大衣里，坚韧地仰望着街上的霓虹。这场面是多么让人心碎啊。

我掉了个头，把车开到单位楼下，像做贼一样钻了上去。在漆黑一片的办公室里摸索了十来分钟，我终于撬开了人力资源部一个同事的抽屉，在两盒“六味地黄丸”底下找到了前两天收到的应聘者简历。借着手机的微光，我费力地从两寸照片上分辨出了那张“桃儿脸”，然后照着她留下的号码发了一条短信：你还好吗？在干嘛呢？信息发出去后，我才想起看那姑娘的名字。原来她叫姚睫，是睫毛的睫，不是清洁的洁。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她一定经常对别人这样说。

## 2 圆明园

那天夜里12点多，我已经窝在床上快睡着了，姚曛才给我回了短信。我绝没什么可抱怨的，对于一个陌生的骚扰信息，她能回过来，就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或者说，她也真够穷极无聊的。

自然，她的回话是：你是谁？

我想了想，回给她：我是谁不重要，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情不太好。

她说：你管我心情好不好呢。

我说：因为我的心情好极了，所以特别希望关心别人。

她说：你有病吧。

我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不好意思再“逗”下去了。我记得有一部欧洲电影，那里面有一个讲文化史的老教授，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却又自卑于自己苍老的面孔，于是便用匿名短信骚扰她，进而与她交谈。像西方电影里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这个老教授也是一个精神有点分裂的家伙，他隐瞒身份向女学生倾诉的时候，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乃至他这个人都破口大骂。没想到这样一来，女学生反而喜欢上了这个“陌生人”，两个人就在电波信号里谈起哲学来了。老教授的风趣、学识深深地吸引了女孩，但显而易见，他本人却陷入了感情的悖论之中：女孩是如此厌恶“他”，而“他”却又必须以自我谩骂来博取对方的好感。最后，他看见女孩和一个年貌相配的小伙子走在了一起，只好悄然身退。他骗女孩说，自己决





定自杀，已经服了药，马上就要死了。他祝她与恋人甜蜜、幸福，又道歉说，自己只想静静地离开，不想让世界上多一个“认识自己”的人——那会增加本已沉重的世界的“重量”。而这个时候，电影情节走上了极端戏剧化的路子：女孩为了“未曾谋面的知心人”而拒绝了男友的求婚，飞奔上了街头。面对一辆偶尔经过的救护车，她情难自禁、泪流满面；而此时此刻，老教授也在咖啡馆的靠窗座位上看到了这一幕。他没想到，女孩爱的正是“他”，巨大的幸福感席卷而来，不光冲晕了他的大脑，也给了他本已脆弱的心血管系统最后一击——恰恰在站起身来与女孩对视的那一瞬间，老教授一头栽倒在地上……

那部电影的画面像油画一样浓墨重彩，布局考究，女演员长得颇有老牌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神韵。记得看完电影之后，我还欣慰地给一本电影杂志写过影评：欧洲导演也学着煽情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而比起这部“全球通时代”的、忘年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中国的编剧就像一群毫无心机的直肠子。在一部大陆投资、港星云集的片子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香港的司机和一个深圳的按摩女用手机聊了起来，男的骗女的说，他是一个赛车手；女的骗男的说，她是一个钢琴家。后来，两个劳动人民终于意识到说谎话是不对的，便抛开面具、坦诚相见，过上了“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此时此刻，我打定主意不再和姚睫“说话”，并不是害怕我们一旦建立了“关系”，情节的发展就会像国产片一样傻。我的想法是：任何试图将电影里的情节搬进现实的企图，都是幼稚、愚蠢的。哪怕模仿的是一部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大师之作。这样的冲动只属于喝一大瓶可乐、吃一大桶炸鸡也没有心理负担的毛头小子，而我已经腹部鼓得买条时髦点的裤子都不容易了。说到底，我莫名其妙地给一个长得像桃儿的姑娘发短信，这个行为已经有点像是“人到中年内分泌紊乱”的前兆了。

于是，我驼着背到卫生间刷牙、洗澡，从抽屉里翻出一瓶过